

# 资源联结：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主体协同逻辑

## ——基于X市W村的个案研究

贺清波<sup>1</sup>, 刘珊<sup>2</sup>

(1.湖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政、产、学、民协同合作是推进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重要支撑。本文有机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四螺旋”模型提出“资源联结”概念, 并构建“主体进场—要素嵌合—属性定位—互动网络”的分析框架, 对X市W村“乡村研学”项目进行考察。研究发现: 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村集体等利益主体受政策导向、市场激励、社会责任及内生发展需求等内外动因的驱使, 携自有资源进场; 四大主体分别具备行政、产业、智识以及乡土资源的优势禀赋, 资源的异质性与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各自的角色定位; 依循“行政引导、企业运营、科研赋能、集体整合”的协同逻辑, 多元力量最终形成产业项目的行动网络。资源联结是主体协同的核心机制之一, 构成了政、产、学、民共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支点。

**关键词:** 资源依赖; 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项目; 主体协同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2-0001-12

## Resources sharing: The logic of agents collabor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 industrial projects—A case study based on W Village in X City

HE Qingbo<sup>1</sup>, LIU Shan<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ural communities serves as a crucial support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rojects. 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the quadruple helix model,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connec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gent engagement—factor integration—role positioning—interaction network”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the “Rural Study Tour” project in W Village, X City has been examined.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gents such a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join the project with their own resources, driven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including policy orientation, market incentiv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needs. These four agents possess distinct advantages in administrative, industrial, intellectual, and local resources respectively, with the heterogeneity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their resources determining their respective roles. Following the collaborative logic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enterprise ope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empowerment and collective integration,” diverse forces ultimately form an action network for industrial projects. Resource sharing is one of the core mechanisms of agents collaboration, serving as a key pillar for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resource dependenc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roject; subject synergy

##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2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收稿日期: 2025-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CZZ039)

作者简介: 贺清波(1999—), 男, 湖南湘潭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政府、基层治理。

但这并非努力的终点,而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如何确保从脱贫攻坚向乡村全面振兴顺利过渡,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sup>[1]</sup>。考虑到乡村产业发展对两阶段有效衔接具有根本性作用,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实现多主体激励相容尤为关键<sup>[2]</sup>。然而,大量乡村产业项目实践遭遇主体协同不足、产业效能低微、责任边界模糊等难题<sup>[3]</sup>,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兴旺的整体进程。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仅凭单一力量难以应对,有赖于多重角色交互联动、优势互补<sup>[4]</sup>。就产业项目中的多元主体协同逻辑研究而言,学界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职能定位层面。从政府角度来看,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需求推动其逐渐从“政权经营者”<sup>[5]</sup>转向“执行型经营者”<sup>[6]</sup>。对企业而言,项目运营实际的动态变化要求其在“私营主体”与“辅助执行者”之间动态调整<sup>[7]</sup>。而因为在产业项目中的“多重代理人”<sup>[8]</sup>角色,村干部应在政府、村民等多重关系间进行协调。二是联结机制层面。利益是联结不同主体的关键枢纽,内置的利益聚合机制更是被视为项目主体良性互动的重要动力<sup>[9]</sup>。要素匹配也是行动者博弈的核心主线,资源禀赋与要素需求的匹配程度通常决定主体的职能分工<sup>[10]</sup>。此外,人情、面子等社会关系互嵌机制<sup>[11]</sup>同样在村域主体协同过程中有着丰富的体现<sup>[12]</sup>。三是保障条件层面。除了向条线部门争取更多的涉农资金和项目资源外,乡村产业项目往往还需动员乡贤、村民等力量<sup>[13]</sup>。当然,随着参与主体增加,分利秩序和协同网络的构建为主体间的有机互动提供了关键支撑<sup>[14]</sup>。

综合来看,学界从多重面向揭示了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所涉及的多方力量及其行动逻辑,为后续研究开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与经验证据。然而,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职能与协同路径,但对内外参与主体在产业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具体互动关系及其生成逻辑缺乏深入追问,未能系统明确勾勒出产业项目的协同体系。此外,资源对于主体协同的作用虽被提及,但内在的联结机制却尚未得到充分阐释。

为此,本文延续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多元协

同的分析范式,拟选取X市W村“乡村研旅”项目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梳理该项目的触发条件、起始基础及发展历程,揭示多重力量如何通过互动演进共同塑造产业协同体系,最终把握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逻辑。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从资源依赖视角出发,突破一元主体研究视角的惯常路径,为乡村场域中政、产、学、民等多主体交互关系提供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二是以“政-产-学-民”四螺旋的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为线索,提出“资源联结”概念并构建“主体进场-要素嵌合-属性定位-互动网络”的分析框架,系统勾勒并深度论证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实践全貌,从而为如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践解释。三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系统考察,为乡村产业振兴研究提供新的关注点与分析思路,拓宽该领域的理论视野,生动诠释乡村振兴的政策内涵。

## 二、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 (一) 理论基础: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是个人或组织等主体开展行动的核心支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对组织的影响、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关系等问题逐渐成为组织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尤为盛行。Pfeffer等人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有赖于外部资源的支持<sup>[15]</sup>。这意味着,任何组织难以拥有全部资源并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所有组织皆须为生存而与环境进行经常性的资源交换<sup>[16]</sup>。定位到乡村场域,其内生的资源差异同样塑造了不同的优势资源主体与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直接影响着各主体参与合作的程度与方式<sup>[17]</sup>。可以说,资源依赖理论通过分析不同主体所拥有的优势资源,并阐释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资源需求情境,为理解各领域主体之间的互动路径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所谓资源,是指为确保行动主体顺利完成任务、落实政策而配套的人、财、物等要素,表征了执行主体实现目标所需的条件和能力<sup>[18]</sup>。依据资源论的观点,乡村场域中的资源禀赋既可视作有形和无形资源的集合,又可划分为行政资源、

产业资源、智识资源以及乡土资源等类型。由于不同资源在主体间的分布存在着差异，且资源自身在所含价值、稀缺程度等方面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各行为主体为达成目标往往需要从外部获取自身所缺资源，从而形成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正如吉登斯所言，行动者的行动依赖于丰富多样的情景资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皆发挥其相应功用<sup>[19]</sup>。归结起来，资源是主体实践的根基，其要义在于为行动提供经济、物质等多方面的保障与支撑。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资源型互动”本质上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资源拥有的多少与类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实力大小，其对于目标实现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资源依赖关系背后，彰显的是多元主体间形成的一种以资源为媒介的良性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长期维系互动结构与模式。整体而言，资源依赖为我们理解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现实切入点，也为探讨共同行动问题提供了学理性支撑。

### （二）联结网络：从“三螺旋”到“四螺旋”

20世纪末，埃茨科威兹与雷德斯多夫在“三螺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著名的政、产、学三螺旋理论<sup>[20]</sup>。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式”创新思维，旨在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尤其在区域层面，三螺旋理论强调区域创新系统的制度网络应呈现螺旋状联结模式，“行政链”“生产链”与“技术-科学链”三者相互缠绕、彼此联结<sup>[21]</sup>。随着三螺旋模型从基础理论分析转向广泛实践应用，相关研究逐渐聚焦“三螺旋”内部的合作关系，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多种要素应保持高度协调与充分嵌合。

在后续研究的推动下，“三螺旋”模型又进一步发展出“四螺旋”“双三螺旋”<sup>[22]</sup>等理论变体，“公民”（民）这一维度亦被纳入分析框架。这主要是由于合作模式单一、内部利益失衡、角色转换趋同等问题使“三螺旋”运作陷入困境，因而纳入“公民”的四螺旋模型应运而生<sup>[23]</sup>。该模型不再单纯关注国家创新战略的宏观建构，而是转向对中微观层面主体间更为细致具体互动过程

的探讨。譬如，有学者将新公共管理范式与三螺旋方法相结合，描绘市政当局、学界、公民及商界“四螺旋”协作过程，重点强调了公民的诸多作用<sup>[24]</sup>。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乡村产业振兴中高校、政府、企业、农户四类主体的联动，推动了四螺旋模型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应用<sup>[25]</sup>。总的来说，四螺旋模型为我们理解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中主体如何达成联结提供了重要参考，是解释政、产、学、民具体互动关系的结构底座。

### （三）“资源联结”：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主体互动结构

依循资源依赖理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可视为一个以政府（政）、企业（产）、学术机构（学）与村集体（民）四大核心主体构成的“政-产-学-民”四螺旋联结体系的复杂行动网络。各主体通过资源的流动与交换，最终形成一种互依互促、协同创新的联结关系。鉴于此，本文融合资源依赖理论与“四螺旋”模型所明确的政、产、学、民四大联动主体，提出“资源联结”概念，并系统构建“主体进场—要素嵌合—属性定位—互动网络”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图1）。该框架旨在深入理解知识经济背景下，乡村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组合，推动新型生产方式及结构的形成、延续与创新。关键在于，“资源”是这一互动结构中连接不同主体的核心纽带，各主体凭借“资源联结”的核心机制达成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同时，资源的稀缺性和流动性也促使各主体不断优化自身的配置策略，从而提升资源开发利用的效能与效益。

乡村产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在于实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sup>[26]</sup>。按照分析框架的逻辑顺序，不同主体在乡村振兴政策导向下携自有资源进场，在产业项目中都有其角色定位并发挥相应作用：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源调配者，主要起到规划引导和支撑保障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产业发展资本、经验、人才等推动合作并创造经济效益；学术机构作为知识创新与科研主体，为产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和智力支持，实现知识的转化和应用；村集体作为村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代表，以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劳动力等资源

为产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总的来说,“资源联结”概念的提出,为揭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中不同行为主体何以构建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该框架首先关注政、产、学、民参与产业项目的核心动机,以此分析各类主体介入的驱动因素;其次,对各种力

量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类型学划分,关注主体资源投入与下沉的具体机制,呈现资源组合的具体形态,从而揭示主体间微观互动的实现路径;进而,依据不同行为主体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明确其角色定位;最后,通过刻画主体之间的资源互动过程,厘清彼此的关系结构与交互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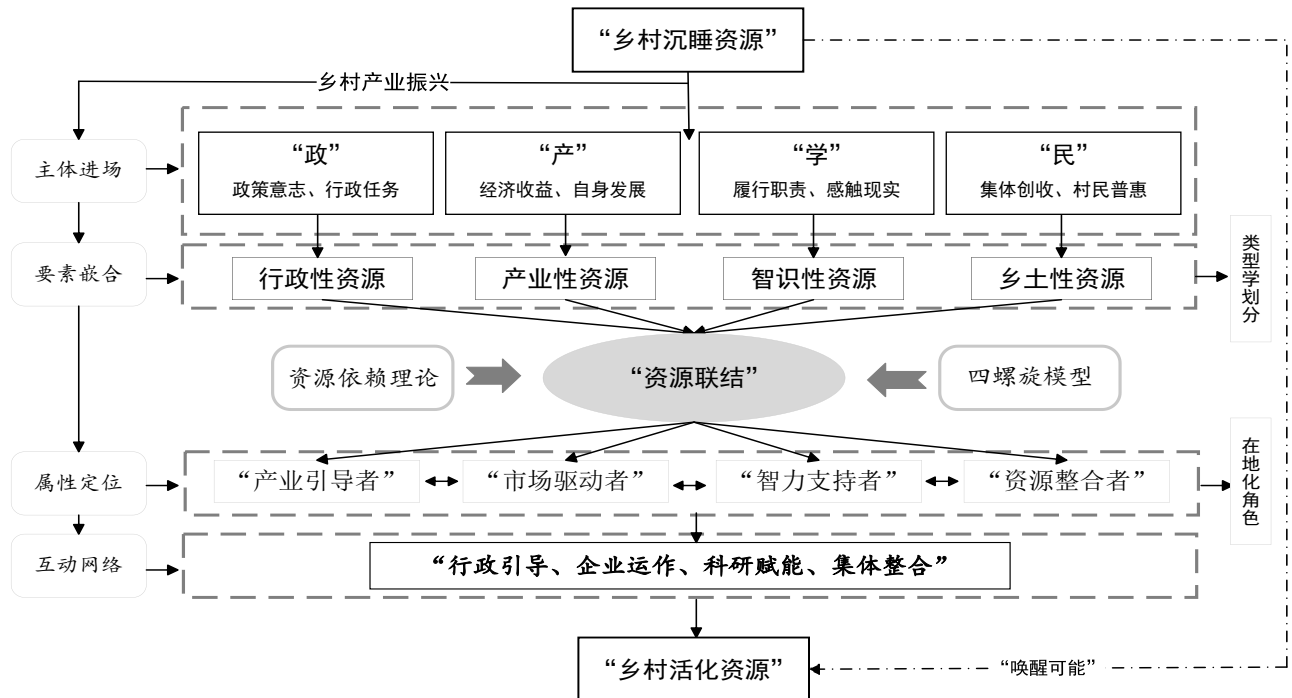


图1 “资源联结”：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主体互动结构

### 三、研究方法 with 案例呈现

#### (一) 研究方法

研究旨在精准识别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中主体间的关系网络及交互逻辑,即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基本样态与协同路径。面对此类有关“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研究,较宜采用案例分析方法<sup>[27]</sup>。综合考量方法选择与案例呈现的协调契合,本文运用单一案例研究方法(即个案研究)对典型个案进行深描,进而挖掘和分析所聚焦案例何以实现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主体协同。个案研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兼具细节描述、情境呈现等独特优势,是应用领域极为广泛的典型方法之一。在Robert K. Yin看来,大众所熟知的案例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能够通过纵向案例来展示现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过程<sup>[28]</sup>。经由案例的完整呈现,得以挖掘一个个生动的“社会缩影”,进而“在讲好现实故事的过程中学到更

多知识”<sup>[29]</sup>。

#### (二) 案例选取和资料搜集

考虑到分析性叙述对个案选择有着充分理论演绎的要求,期望在分析框架的指引下创造足够叙述空间推动解释机制的呈现,以尽可能地达到理论概推的目的<sup>[30]</sup>。因此,本文遵循样本选择的基本原则,选择X市W村作为叙述个案:其一,典型性。2022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评选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揭榜之时,W村获此殊荣并被评为农家乐特色村。此外,该村多次受到县市级媒体宣传报道,日益成为当地乡村研学旅游的特色品牌与典型范本。其二,问题具有普遍性。个案研究的最终目的便是以个案情况的描述或引证为契机,解释真实环境中的事件与行为,从而助推现实问题的解决。W村所开展的实践作为全国诸多乡村文旅产业项目之一,相当程度上具备其他个体的一般性特征。其三,资料可得性。笔者多次深入W村开展实地调研,与该项目多名相关人

员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翔实的资料素材，对项目有着一定了解与把握。

研究遵循“三角互证”原则，收集到以下资料素材：一是实地调研过程中搜集的一手访谈资料。通过与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当地农户等人员的数次半结构化访谈，笔者全面深入地掌握了该项目的开发缘由、运营过程等内容，并重点关注了相关主体的资源依赖关系。二是调研过程中搜集到的文件材料。实地调研阶段，笔者对项目日常运作的报告、数据等文件资料进行了详细搜集与有序整理。三是关于该项目的新闻报道。项目开展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是全县乃至全市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优秀名片，有着一系列相关宣传报道素材。笔者对这些相关新闻报道、案例宣传等进行搜集与整理，得到的内容可作为案

例论证的有益补充，形成多重印证。

### （三）案例深描

W村于2016年4月由Z、B两村合并而来，全村国土面积9.12平方公里，共辖22个村民小组。此时，相比于市里其他村，W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长期匮乏、青年人口流失严重，为原省定贫困村。但该村生态环境良好，紧邻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2019年，为改变该村自有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实情况，时任W村党总支书记H充分考虑本村客观条件，大力发展“研学+文创民宿+农旅”的产业模式，自主探索出一条后发地区的脱贫振兴之路。经过阶段性发展（图2），W村逐步实现从贫困村到特色旅游村的重大飞跃，为全国乡村产业振兴之路的探索提供了经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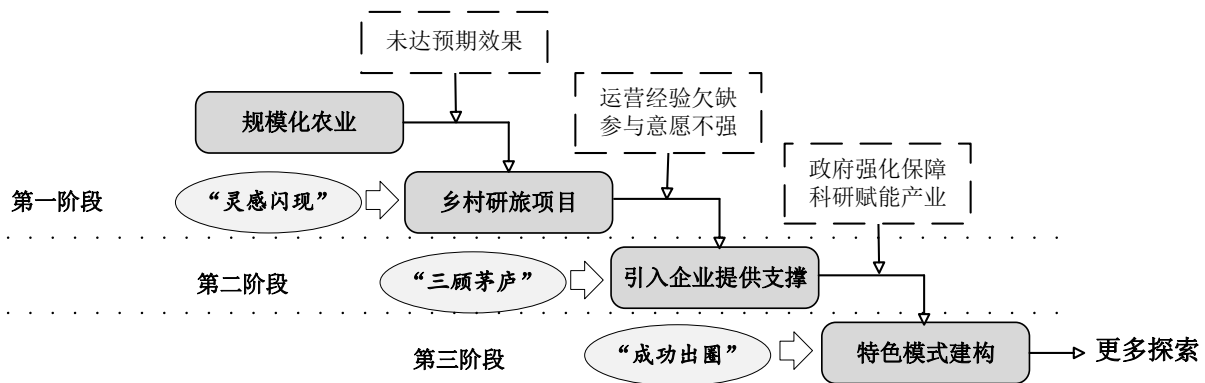


图2 W村“乡村研旅”项目的探索历程

#### 1. “有心无力”：转型尝试与资源闲置

一般而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则是理念的生动体现。这意味着，乡村内生发展变迁，需要具备变革意识、发展理念等智识洞见的村干部充当带头人角色，继而促成实践尝试。X市W村“乡村研旅”项目的兴起，正是缘于村书记H的创新构思。2017年，25岁的H当选W村党总支书记，成为本村发展建设事业的主要负责人。在接手本村事务初期，H试图带领村民以规模化、特色化农业产业方式助力本村发展，但项目均未达预期效果。对此，为了进一步谋求一条适合本村的发展之路，H联合村干部多次前往深圳、贵州等地开展调研学习，积累了大量发展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产业发展思路。

“长期居住在城里的学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乡村研学旅行需求，而本村恰好拥有大量的‘沉

睡’资源有待开发，何不吸引当地各大中小學生团体来此研学呢？”（20250127-村干部F）

考虑到W村上世纪曾作为本地商贸集聚地，尚存有各类传统作坊旧址20余处。H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结合可持续的乡村文旅产业，将本村这些“沉睡”资源转变为“活化”资源，才能带领村民走向致富道路，从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村两委随即积极拟定本村“乡村研旅”项目的发展目标，逐步明晰了项目推进的初始方案。H与村干部经调研与论证，初步明确了本村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并针对乡村旅游开发事宜展开前期筹备与规划部署。

“我们村搞这个项目的目的还是为了响应当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上级政府对这个也比较重视。……正好通过这个项目看能不能消除村里的贫困情况，改善下民生。”（20250119-镇干

部H-原W村党总支书记)

## 2. “喜忧参半”：摸索前行与多元助力

W村的乡村旅游规划看似具备充分的可行性，然而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譬如，受限于W村基础设施薄弱、运营经验欠缺等现实条件，H向多家旅行社发出的合作邀约均被婉言拒绝。此外，在项目规划阶段，即使H及村两委广泛动员，仍只有8户农户有意愿发展成“接待家庭”，其他大多数农户都持观望态度。经由道路打通修缮、房舍翻新改造、停车场所扩建等一系列举措，加之村干部的“三顾茅庐”，KF旅行社最终与W村达成合作共识。旅行社主要负责人C在进一步把握W村的产业发展需求后，联合W村委会成立了FN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试图打造X市首个乡村研学旅游品牌。

“肯定有困难不，好不容易嘞。当时这些农户，家里的民房，他宁愿放在那里空着、烂掉都行。……一开始他们是不愿意接的。一个是没有搞过这个事情，另一个是怕这个钱许久都拿不到，再一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钱赚。”(20250127-村干部F)

2019年，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W村“乡村研旅”项目正式拉开序幕。但囿于旅游开发相关经验不足，村两委只能在摸索中前行，逐步寻求旅游开发与乡村发展的契合点与平衡点。该项目的核心模式是以本村自有资源为基本盘，通过盘活闲置宅基地、拓展非遗体验、推广农家文创，打造紧邻4A级旅游景区的“5分钟交通圈”的“乡村研旅”。研学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了系统性的体验场域，既包含对自然景观的实地观察，也涵盖对乡土社会风貌的接触与理解，并进一步延伸至农耕生产实践的具身体验，为参与者建构起多维度的乡村认知体系。

“你看到我们街道上挂的那些牌子没有？比如说那个什么煎饼坊、扎染坊、面条坊，各种各样的坊，游客来了要保证有足够的项目体验。这个项目事情那还是蛮多啦，要带动好多人。”(20250127-农户L)

W村“乡村研旅”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包含村民、村集体、旅行社、高校、政府等多方力量在内共同经营的结果。除了“村内”人员用心经

营外，县市各级领导对W村的工作也相当重视，累计投入2000万余元以完善基础设施，并推行多项相关利好政策大力扶持发展。同时，X市人社局2019年向W村派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指导工作，全市“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试点工作动员大会”也在此召开，足以凸显上级的重视程度。此外，X大学、H师范大学、H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在此授牌设立研学基地，专家学者定期受邀为本村“辅导”“把脉”。在多方助力下，W村“乡村研旅”项目得以顺利走过第七个年头，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 3. “成功出圈”：效益实现与模式建构

经由多方努力，W村“乡村研旅”项目所取得的综合效益显著超出了预期。FN公司自运营以来，主要采取村民经营、集体分红、务工参与以及资产租赁等方式帮助农民增收，一大批贫困户实现了脱贫。截至2023年，全村游客接待量已逾10万人次，综合营收达800多万元。在此基础上，项目安排脱贫人口参工参建50余人，扶持农户创办研学接待家庭76户，就近吸纳就业近200人。由此可见，W村通过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振兴项目，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深刻改变了村集体经营模式，有效地拓宽了村庄创收途径，显著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

“现在我们一户差不多负责二十来个游客，一般能够赚到七八百块钱一回。对于我们这种常年在乡下的人来说，这个收益那还是很可观的了。有时候我们也还在调侃啊，说是要‘抢着’参加。”(20250309-接待家庭C)

截至2025年，W村已先后荣获“省文明村”“全国文明村”“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荣誉称号，受到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经过多年摸索，W村已经打通一条“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渠道。值得强调的是，“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运行模式是这一项目的核心所在，乡村文旅产业在该村得以有效运转。总的来说，W村“乡村研旅”项目强调绿色乡村打造与网红经济发展双重并进，是以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助推村庄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也是全国诸多乡村振兴实践的生动缩影。

#### 四、案例分析：“政、产、学、民”联结参与的行动逻辑与结构体系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顺利运作乡村文旅产业项目绝非易事，有赖于多方力量的助力及优势资源的加持。政、产、学、民等主体赋能，为乡村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推动了资源的存量利用与增量发展。纵观整个案例，政、产、学、民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主体间的资源联结进程，并依循一定行动逻辑以构建起相应的交互网络。

##### （一）主体进场：多元参与的动力基础

所谓动力基础，也即动机，代表了驱动主体作出决策与开展行动的内外在力量<sup>[31]</sup>。毋庸置疑，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主体行为，被视为推动主体做出行为选择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文旅产业的具体实践场域中，身份、位置等条件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体，势必有着不同利益偏好。以村域各行动者的动力基础为观察起点，剖析其基于理性计算或是感情考量做出的行为选择是研究所首要回答的问题。

从政府角度来看，乡村振兴关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sup>[32]</sup>，是国家战略向地方延伸的制度化实践。本质上，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性职责所在。在此语境下，W村打造颇具本地特色的乡村文旅产业并非只是发展当地经济的工具，更是实现贯彻上层意志、改善民生福祉等多重任务的综合性抓手。此外，虽然文旅项目并非常规意义上的项目下乡，却也是晋升锦标赛体制下能引起上级政府关注并获得绩效认定的重要途径<sup>[33]</sup>。因而，借助这一“载体”实现政策意志落地、争取上级肯定等多重目标，成为市县乡多级政府综合考量后助力示范建设的重要出发点。

能否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是企业参与项目的基本考量，而促进自身发展壮大则是其深层动因。根据“成本—收益”模型，乡村土地承包、设施建设等前期成本低于城市，且项目也有着更具可控性、稳定性的激励条件<sup>[34]</sup>。同时，外部资本对乡村文旅产业的长期投资具有正向预期，因此对参与项目开发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案例中，KF旅行社受W村“让利市场、助益村民”原则的

驱动，且前期70%以上的利益让渡空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服务乡村和实现创收的双重驱动下，企业能够准确研判乡村振兴的政策红利并全面评估乡村文旅产业项目的经济合理性，进而做出资本“下乡”的理性选择。因此，市场主体往往受制度激励、预期收益与发展空间的共同吸引，通过实施切合本土的运营策略，并将其嵌入乡村社会网络，以实现资本增值与市场拓展等核心发展目标。

学术机构的参与动力，既源自科研资源的获取需求，也体现为响应国家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的多重考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联盟、研究中心等各类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搭建日益普遍，为各类科研机构参与乡村产业提供了广阔舞台<sup>[35]</sup>。这一趋势不仅拓宽了学术机构深度参与村域项目的渠道，也为广大科研人员实地获取乡土经验、实证材料提供了便利。从案例来看，X大学、H师范大学等尝试以基地打造、教学合作等方式融入乡村产业建设，以期获得就业实习、实践教学、成果转化等预期成效。总之，“学术机构—乡村”的复合型合作机制逐步成为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师生深入田间地头，被视为真切感受乡村振兴成效的可行之举。

从村集体视角出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打造为盘活村内资源以实现内生发展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村域发展的最大掣肘在于难以寻得与本村条件相适切的特色产业，更谈不上实现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正是包括W村在内的村域的普遍性困境。近年来，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休闲旅游、生态体验等以文化与安全为内在属性的消费品需求激增<sup>[36]</sup>。恰好乡村拥有该群体所期望体验的田园生活、自然生态及乡土文化，响应市场增长需求打造文旅产业正当其时。根据一般性发展规律，项目一旦切实落地，能够获得增收致富、创造就业等多重直观好处，更能使当地村民享受到项目开发带来的普惠性发展成果。借助乡村文旅产业构建新型集体实现创收，构成了村民集体参与项目的直接且现实的激励来源。

##### （二）要素嵌合：主体资源的纵横联合

经典理性选择理论表明，行动者所具有的一定利益偏好是其动力基础，资源则是其采取行动的条

件和保证<sup>[37]</sup>。这意味着,资源是行动主体达成所定目标的能力与基础支撑,是项目能否切实落地及长效运作的关键所在。鉴于不同资源禀赋在主体间分布不均,多元主体自身优势资源的注入与嵌合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要素效能。

### 1. 行政资源的自上输入

除了必要的经济投入外,政府部门还会为项目提供专属的政策性支持和象征性资源。首先是具备政治属性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该制度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载体,亦通过驻村代理角色功能的发挥,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合法性与战略导向保障。这一制度是国家对村庄的一种新的资源输入形式,仍属国家正式制度范畴<sup>[38]</sup>。政府部门还会高位推动一定量的公共资源支持,反哺乡村产业发展。W村周边4.8公里长的省级景区连接公路、2000平方米停车场等配套设施的打造,政府背书的基地挂牌等,都是行政力量支撑作用的集中体现。归结起来,政府部门通过靶向支援行政性资源,从整体层面上赋予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更多可能。

### 2. 产业资源的向内供给

长期以来,乡村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难以将本村“沉睡”资源打造成可利用的产业要素,尤其缺乏专人打理相关事务。虽说“外来者劣势”理论在涉农领域得到验证,但外来者会产生监督不力、财务困难等问题<sup>[39]</sup>。但不可否认,企业在资源变现与经营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将外部资源要素有效引入村内,推动村庄自有资源价值转化<sup>[41]</sup>。同时,伴随着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的系统性引入,这一过程能够有效强化乡土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案例中,KF旅行社正是通过选派专业驻村经理长期扎根村内、注入资金等方式,力求全面融入乡村社会并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总的来说,企业力量往往能依托其资本运作、信息分析、资源整合等竞争优势,针对性突破乡村资金短缺、技术人才不足、发展机会匮乏等瓶颈。

### 3. 智识资源的定向援助

作为知识的“生产基地”,高校等学术机构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学术经验、人才储备等资源。从更为深层的内在特性出发,学术机构凭借所掌握的科学、信息等资源优

势与乡村主体开展知识互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sup>[40]</sup>。当然,学术机构所具有的创新意识、问题导向等也正是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为打造当地品牌特色提供了智力支撑。从W村的案例来看,省内多所知名院校不定期提供专业性指导,实现了智识资源从学术机构“流入”乡村场域。归结起来,在“智识资源”与“乡土资源”的直接碰撞与深度融合中,科研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得以实现。

### 4. 乡土资源的全面盘活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考察乡村地区产业发展需更加细致解构域内自有资源。相较于外部资源的输入,乡村自有的乡土资源禀赋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了牢固“地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通常为集体所有,以公有财产的形式存在<sup>[41]</sup>。这意味着,项目运作所需的土地、生态以及文化资源往往须由集体统一规划开发,从而为乡村文旅产业项目开展提供物质基础。回到本文的案例实践,W村村民所拥有的闲置农房、传统文化等资源统一交由集体整合管理,引导着项目向规模化、组织化、集体化方向发展。此外,乡村社会的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熟人社会”的文化基因,有赖于“面子”“熟人”等社会性资源来组织动员集体内的村民。总之,乡村有着较为丰裕的社会性资源,构成了维系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隐性支撑体系。

### (三) 属性定位: 内外力量的职能分工

作为一项复杂性、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内外力量通力合作并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根据四螺旋模型的结构属性,政、产、学、民分别作为产业引导者、市场驱动者、智力支持者以及资源整合者而存在。显然,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各类行为主体都承担了一定的职能分工并相应发挥其独特作用。

#### 1. “产业引导者”: 政府助推乡村发展

通常而言,政府部门需要在精准把握自身角色定位与充分尊重乡村主体性地位之间达成平衡,以“显性在场”与“隐性在场”两种方式积极介入。一方面,借助驻村干部等政府“代理人”确保上级重要指示和安排部署清晰地向下传

达<sup>[42]</sup>，引导乡村产业项目“在轨”发展；另一方面，以地方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导向并持续释放“认可”“挂牌”等象征性符号，构建起可持续、强引导的制度环境。客观上，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徘徊于“公益”与“谋利”之间<sup>[43]</sup>，在设施建设、政策帮扶等方面充分发挥引导服务功能，同时也致力于将乡村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sup>[44]</sup>。近年来，随着乡村发展自主性不断增强，政府行为逻辑正从主导建设逐步转向引导赋能，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激发乡村内生动能。

### 2. “市场驱动者”：企业负责市场运营

乡村发展长期受自身条件所限，有待外部力量弥补其在运营规划、市场渠道等方面的短板。企业与生俱来的逐利属性与“市场基因”<sup>[45]</sup>，为乡村产业供给与外部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相较于当地村民和村集体，企业更适宜承担起市场化运营职能，包括日常运营管理、完善操作规则、开拓盈利渠道等事项。当然，缺乏乡土社会知识、产业扩张步伐过大等也将使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与风险，需对项目运作的收益与风险进行综合权衡。显然，企业的角色分工明显区别于政府、高校等以社会效益为优先考量的主体，是乡村产业项目商业效益实现的强力引擎与重要支撑。

### 3. “智力支持者”：科研赋能产业繁荣

当前，国家系列政策的出台指明了高校等学术机构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价值，为其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合法性依据<sup>[46]</sup>。毋庸讳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之一，要求以知识溢出效应实现乡村产业的系统赋能。这意味着，学术机构必须突破传统学术组织的边界，重塑其在乡村产业项目中的功能定位，以科教优势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然，学术机构在筑牢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过程中必须深入调研、找准需求，与乡村建立起长效合作机制。总之，学术机构的参与不仅促成了知识的跨域流动，更驱动了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转型，实现了“知识传播—在地应用—情境化再生产—再传播”的完整知识循环。

### 4. “资源整合者”：集体管理日常事务

通常而言，村集体是集财产所有、经营管理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综合体，既是联结外界的核心

枢纽，也是组织群众的核心力量，更是村民意志的集中代表。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村集体凭借其制度性权威与社会资本，发挥着利益协调与资源整合的重要作用。在村集体的主导下，土地、生态等核心资源得以有序整合与系统配置，兼顾效率与公平。当然，作为联结农户、企业等主体的纽带，村集体也能凭借对乡土环境的熟识迅速动员各方力量。因此，作为场地提供方的W村村集体发挥着主心骨作用，统筹协调农户、游客以及驻村经理等广泛有序参与。总的来说，村集体为各主体间的广泛交互搭建合作桥梁，在维护乡土社会本位利益的同时，确保外部要素的渐进式嵌入。

## （四）互动网络：行动体系的最终建构

在乡村场域中，各行为主体依据自身角色定位发挥相应作用，形成了“行政引导、企业运营、科研赋能、集体整合”的联动机制。可见，以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为载体，内外多元力量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良性互动。考虑到主体联动形式由核心圈层的协同合作与非核心圈层的互动配合共同构成，借鉴三螺旋理论中“链”的概念，本文将概括为联结网络的“内链”与“外链”（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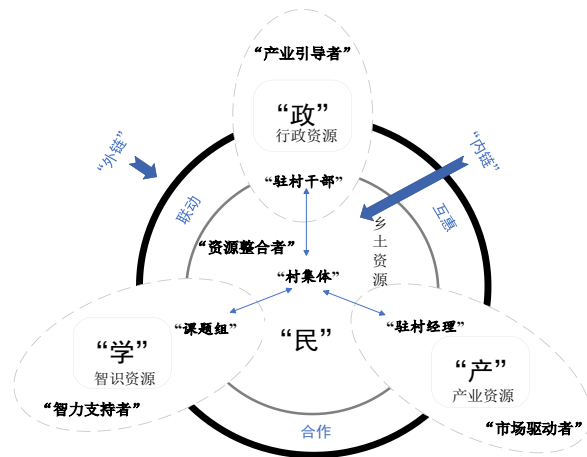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主体协同网络

### 1. 联结网络“内链”

纵观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建设过程，项目开展主要以村庄为行动场域，又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因而，与村集体发生直接关系的核心圈层可视为联结网络“内链”。一是“产民之间”。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村集体与企业双方的合作规

则逐渐固定下来,进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W村的案例实践来看,村企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由原初的“按次数分配”调整为当前的“按人头分配”,显著调动了村集体的参与积极性。二是“政民之间”。这一纵向互动结构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行政性资源对乡村文旅产业体系的嵌入,其中驻村干部发挥着关键作用。在W村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驻村第一书记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有效实现了政策的上传下达与资源的协同整合。这是源于,第一书记所掌握的资源与乡村自有资源在非正式与正式制度弥合情景下会形成资源联动效应,得以释放乡村“沉睡”资源活力<sup>[47]</sup>。三是“学民之间”。村集体与学术机构的互动则较为简单,主要以信息联结双方。具言之,学术机构通过所具智识向村庄提供专业指导,乡村则反馈其所需的乡村产业实践一手素材。

## 2. 联结网络“外链”

在乡村场域之外,政、产、学之间围绕项目亦有诸多联动,可视为联结网络“外链”。一是“政产之间”。政府通过政策性支持与针对性指示积极作为,意味着辖区内企业经营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将迎来利好局面;而企业积极做大做强本地文旅产业,将会反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企协同使得乡村文旅产业逐步实现转化与升级,为产业规模化、长效化铺平道路。二是“产学之间”。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教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学术机构置身于产业日常运作之外,能够给予更加清晰透彻的发展建议,恰到好处地释放其专业优势;而企业可为科研人员参与乡村文旅产业提供“实战基地”,在人才培育、产教协同等方面有所助益。三是“政学之间”。这两者间的互动往往根植于某一特定事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偶然性。譬如,W村就曾以农特产直播带货为契机,拉动政府和学校等相关人员的联动参与。

围绕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构建,W村及其他相关主体以自有优势资源为纽带,以村庄为核心互动场域,以产民、政民、学民的交互构成核心圈层的协同合作,以政产、产学与政学间的交互构成非核心圈层的互动配合,通过各组成部件环

环相扣实现联结网络“内链”与“外链”两者的统一,最终形成价值共创的互动网络。更为巧妙的是,通过乡村振兴政策共识的构建,政、产、学、民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循环体系逐渐形成,既保证了项目行动的完整性,也确保了主体互动的持续性。归根结底,内外部多元主体以“资源联结”逐渐达成力量聚合,形成了一套乡村产业发展框架下互利共赢、角色互补、优势互补的整体性逻辑。

## 五、进一步讨论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地区面临着产业项目和青壮群体双重缺失的境况,以致发展成效并不那么明显。对此,全国各地积极寻求乡村产业振兴道路,乡村文旅产业项目逐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抓手。本研究关注的W村,通过打造“乡村研旅”项目,构建起与自身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特色产业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四螺旋”模型提出了“资源联结”概念,系统构建了“体进场—要素嵌合—属性定位—互动网络”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企业、村民等不同利益攸关方在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中的角色定位,分析了政、产、学、民之间的跨界合作伙伴关系及其重要作用,刻画了多主体间的复杂协同网络。

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资源”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具有重要联结作用;第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文旅产业项目的落地落实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工程,有赖于政府、村集体、村民、企业以及高校等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且各自应有明确的角色定位;第三,在乡村场域中,多元主体间互动网络的构建过程是相互塑造、相辅相成的,由此建立起一个结构完整且互动良好的乡村产业行动体系;第四,从乡村文旅产业实践来看,项目成效直接体现为多方主体在合作中的绩效,本质上映射出乡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通过对所选案例的系统考察,本研究还反思与回应了乡村产业项目何以推进、乡村主体的依赖性等学术议题。第一,本研究回应了理论界与

实务界关于乡村产业何以兴旺的探索与争鸣。历史与实践均表明，乡村文旅这一产业发展形式不是某一主体的单打独斗，也并非各力量间的零和博弈，而有赖于多主体间的通力合作。第二，“资源联结”解释了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场景下的主体行动逻辑，是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的核心动力机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优势资源的互补是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主体间互动的行动基点，打破了单个主体能力不足的局限，超越了一般合作模式中的简单交互关系。第三，“政-产-学-民”四螺旋模型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研究开辟出新的学术理路。在百花齐放的乡村振兴产业主体互动研究基础上，这一理论模型的引入明晰了行动过程中的核心主体，建构起乡村产业发展及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研究的一般范式。

当然，乡村文旅产业获得可观增长固然重要，然而普适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并不存在。这意味着，乡村振兴的实现必须兼顾标准遵循与现实国情，探索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之路，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而引发环境或社会问题。本研究的W村“乡村研旅”项目的开展，折射出乡村地区通过挖掘内生发展动力，以农民“在场”实现其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的不断增强。最后，本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窗口，而现实实践场景比本文所呈现的更为复杂。比如，村集体内部的互动，如何使村民行动成为集体选择？主体互动结构是否随发展进程产生变化？乡村文旅产业何以确保持续发展后劲？未来可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汪三贵, 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8-14, 154.
- [2] 朱海波, 聂凤英.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5-25.
- [3] 雷明, 王钰晴. 交融与共生: 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20-36.
- [4] 梁海兵.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 一个嵌入机制的分析框架[J]. 学海, 2022(5): 72-81.
- [5] 杨善华, 苏红.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 社会学研究, 2002(1): 17-24.
- [6] 许源源, 康儿丽. 执行型经营者: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4): 121-133.
- [7] 严文利. 数字平台企业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以T企业社会责任项目H为案例[J]. 公共治理研究, 2025(4): 61-76.
- [8] 卢素文. “经营形象”: 村干部行动与资源匮乏型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江西省Q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5(5): 85-95.
- [9] 陈荣卓, 车一頓. 利益聚合与行动协同: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建构?——来自武汉市星光村的经验观察[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10): 65-73.
- [10] 高强, 鞠可心. 要素匹配、资本选择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基于外来资本与村社资源的博弈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4): 58-76.
- [11] 李海金, 刘凤萍. 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J]. 求实, 2024(5): 83-95.
- [12] 马荟, 庞欣, 奚云霄, 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3): 28-41.
- [13] 梁琦. “新经营村庄”: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33-44.
- [14] 杜春林, 王梦雅. 从分利到整合: 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4(1): 43-51.
- [15]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Dependence Perspectiv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16] 马迎贤. 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1): 116-119, 130.
- [17] 向良云. 资源依赖、关系结构与治理策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态——基于鄂西南典型乡村的调查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3): 131-141, 174.
- [18] 支广东, 李强彬.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3): 39-50.
- [19]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20] 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109-123.
- [21] 方卫华. 创新研究的三螺旋模型: 概念、结构和公共政策含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11): 69-72,

- 78.
- [22] 周春彦, 亨利·埃茨科威兹. 双三螺旋: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170-174.
- [23] 黄瑶, 王铭. “三螺旋”到“四螺旋”: 知识生产模式的动力机制演变[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1): 69-75.
- [24] Nguyen H, Drejer I, Marques P. Citizen engagement in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paradigm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4, 26(12): 3622-3642.
- [25] 惠志丹, 程华东. 高校参与精准扶贫与服务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探索——基于华中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建始县的实践[J]. 中国农业教育, 2021(2): 34-44.
- [26] 陈锡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5-12.
- [27] 陈世香, 牛一凡. “制度趋同”: 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4): 156-167.
- [28] Robert K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29] 张静. 社会治理: 组织、观念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30] 陈琤, 陈永海, 陈斌. 行动逻辑、权力结构与城市公用事业供给模式——基于广州环卫改革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2): 93-105.
- [31] 谢康, 李晓东, 夏正豪, 等. 用户潜在创造力对数字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机—机会—能力理论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4(6): 136-154.
- [32] 豆书龙, 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 改革, 2019(1): 19-29.
- [33] 李祖佩, 钟涨宝. “经营村庄”: 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20(3): 39-50.
- [34] 刘合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25-33.
- [35] 周晓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瓶颈及对策建议[J]. 世界农业, 2019(4): 32-37.
- [36] 温铁军, 杨洲, 张俊娜. 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的实现方式[J]. 行政管理改革, 2018(8): 26-32.
- [37] 杨婷, 靳小怡. 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4): 16-25, 95.
- [38] 谢小芹. “双轨治理”: “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广西圆村的田野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53-62.
- [39] 钟真, 余镇涛, 白迪.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外来投资重要吗?[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6): 76-93.
- [40] 解涛, 杜建国, 许玲燕.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3): 478-487.
- [41] 钟真, 廖雪倩, 陈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路径选择: 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13-25.
- [42] 李棉管, 蒋巧玲, 吴多妹. 行政下沉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L村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102-113.
- [43] 印子. 发展型基层政权: 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11): 51-61.
- [44] 郭俊华, 卢京宇. 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与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42-51.
- [45] 陆文荣, 卢汉龙. 部门下乡、资本下乡与农户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2): 44-56, 94-95.
- [46] 黄巨臣, 霍胜君. 地方高校参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多案例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4): 76-89.
- [47] 杨晓婷, 陆镜名, 刘奕辰, 等. “资本下沉”赋能“资源释放”: 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村脱贫的行动逻辑与高效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6): 49-67.

责任编辑: 李东辉